

弹子袋



弹子袋

[法]约瑟夫·若福

王念 周娅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Un Sac de billes
JOSEPH JOFFO

本书根据JEAN-CLAUDE LATTES

1973年版译出

弹 子 袋

(法) 约瑟夫·若福 著 王念 周娅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85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33 定价：1.15元

印数：00001——40000册

译者的话

《弹子袋》是法国近年来颇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作者约瑟夫·若福一九三一年生于法国巴黎，是法国当代文学界的后起之秀。《弹子袋》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安娜和她的管弦乐队》、《热雷巴的老妪》、《台式足球》、《多味果》等多篇小说。他的作品曾获得卢森堡广播电视大众奖的一等奖。

《弹子袋》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幼年时期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在未被德国法西斯完全占领的法国南方一些城市的奔波流离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法国战时的社会状况。小说自一九七三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经销不衰，成为法国近十年来最畅销书之一，并译成十八种文字在世界各地销售，改编成电影后也深受欢迎。

本书文笔幽默，写作风格新颖、活泼，语言简洁、维妙维肖地刻画出儿童令人可爱的心理活动和真挚情感。书中一些章节经法国教育部批准，已列入中小学教科书中。

译者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有误，恳请读者指正。

前 言

这本书不是历史学家的著作。

它是我对十岁那年的童年的回忆，讲述我在法国被占领期间的历险生活。

三十年过去了。记忆和忘却一样能够改变一些故事细节。但主要的东西是记忆犹新的：它的真实性、它的亲切感、它的诙谐和惊慌所在，无一不历历在目。

为了不触动人们的敏感之处，故事中的许多人名都已更换。小说叙述了两个孩子在残暴、荒谬但有时也会获得意外救助的世界里生活的故事。

献给我的家庭。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作家克劳德·克洛斯，他阅读了我的原稿并以他可靠的手进行了修改。

第 一 章

衣袋里的一个弹子球在我的手指间滚动。

这个弹子球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总是把它随身带着。有趣的是，它是所有弹子球里最难看的：同哈梅大街拐角上吕邦大爷的店铺橱窗里所陈列的弹子球一点也不一样。那些是令人羡慕的玛瑙弹子球、铅制弹子球，而我这个却是泥做的，光滑的釉面已经斑斑脱落，凹凸不平，曲线纵横，象是教室里那张地球平面图的缩制品。

我很喜欢它。口袋里装个地球多有意思，高山、大海，这一切都藏得好好的。

我是个巨人，我身上有所有的星球。

“喂，他妈的，你拿定主意了吗？”

莫里斯等着我弹下一个球，他坐在猪肉食品店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的袜子总是穿得皱皱巴巴的，爸爸叫他“手风琴演奏家。”

他两腿之间有个四个弹子叠在一起的小堆：一个弹子压在另外三个摆成三角形的弹子上面。

艾普丝丹奶奶坐在门口看着我们玩。她是个保加利亚老太太，干瘪瘪的，满脸皱纹。她奇特地保留着大草原的风沙在脸上涂的紫铜色。她坐在门洞里的草垫椅子上，克利尼昂库门一带铅色的天空是不能使这个巴尔干半岛人的容颜褪色

的。

她每天都坐在那里，冲着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微笑。

听说她是徒步越过整个欧洲，逃过沙皇对犹太人一次次的大屠杀，来到巴黎十八区的这个角落安身的。在这儿，她遇到了东方的逃亡者：俄国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托洛斯基的战友、知识分子和手工艺人。她到这儿来已二十多年，虽然脸上颜色没变，对往事的记忆已该淡漠了。

她看着我身子左右摇摆，笑了，两手搓着旧哗叽布的围裙。这围裙和我的小学生罩衫一样黑。那还是所有小学生都穿黑色衣衫的时代，一个戴重孝的童年，这在一九四一年是个不祥的征兆。

“哎呀，他妈的，你干什么呢？”

我当然要犹豫啰。我弹了七回了，都没弹中。莫里斯，他倒挺美的，光是在课间休息赢的弹子，就把他的几个口袋鼓得象皮球一样。他的身上装满了弹子，都快要走不动啦。可我，只剩下最后一个——我心爱的那个。

莫里斯发着牢骚：

“我才不屁股擦地等到明天呢……”

我下手了。

手心里的弹子微微颤动，我睁大眼睛弹射，又射歪了。好，完事了，没有什么奇迹，该回家了。

戈尔登贝格猪肉食品店的建筑风格挺别致的，好象是外面罩着一个玻璃鱼缸。马卡德大街的铺面参差不齐，

我的脸朝着左边看，因为莫里斯走在我右边，这样，他就看不到我哭。

“别哭啦。”莫里斯说。

“我没哭。”

“你一往那边看，我就知道你哭了。”

他用一只衣袖的背面朝我抹了一下，我的脸干了。我没吭气，加快了脚步。我们要挨叱了，因为半个多小时以前就应该回到家。

我们到了：那不是，克利尼昂库大街。那边有我家的铺子，宽宽大大的字母油漆在门脸儿上，笔划有粗有细，和预备班的女教师写得一样好：“若福理发店。”

莫里斯用胳膊肘推了推我。

“拿着，真有意思。”

我看着他，拿起他还给我的弹子。

刚赢了别人最后一个弹子，又还给他，这才象是对待兄弟的样子嘛。

我收回了我的“小地球”。明天在学校的室内操场里，我要用它赢回一大堆弹子，还要把莫里斯的弹子也赢过来。他别以为比我大那么该死的二十四个月就可以对我发号施令。

再说我已经十岁了。

我记得后来我们进到了理发间，顿时各种气味向我袭来。

每个人在童年都曾体会各自特殊的气味。我呢，曾享受到从熏衣草到紫罗兰各等香水的气味。直到今天，回忆那橱窗上的香水瓶还历历在目，我还能嗅到白毛巾的气味，听到刀剪的咔嚓声——我的启蒙音乐。

当我和莫里斯到家时，理发间已经挤满了人，所有的椅子都被占上了。迪瓦利埃先生如同往常，当我经过他身边

时，拉了一下我的耳朵。我相信这老家伙要在理发厅过一辈子。他大概是喜欢这里的装饰和闲聊的气氛……这是可以理解的：上了岁数，又是鳏夫，呆在西玛街五层楼的三间套房里，一定不好受，所以他上街到犹太人的家里消磨下午的时光。他总是坐在靠近衣帽架的老位子。等所有的顾客走光了，才起身坐到理发椅上，吩咐说：“来刮刮胡子。”

总是爸爸给他刮脸。爸爸会讲各种神奇美妙的故事，是街上的故事大王。他后来死在焚尸炉里了。

我们做完了作业。我那时没有手表，可是估计不会超过一分钟。我对自己的课程总是没学就会的。我们在房间里磨蹭了一段时间，免得妈妈或某个哥哥把我们轰回来学习，然后我们又出门了。

阿尔贝正招呼着一个大个的卷发男人，卖力地给他理着美国头，可他还是回过头来。

“作业做完了吗？”

爸爸也看了看我们，我们却趁他在钱柜那儿找钱的功夫，溜到了街上。

那才是最美的时光哪。

一九四一年的克利尼昂库门是男孩们向往的地方。

今天，建筑师们所说的“给孩子们创造”总是使我惊奇。在新建的住宅区里的街心广场上有沙坑、滑梯、秋千、成堆的新玩意儿。这些娱乐设施，都是那些持有大叠儿童心理学毕业证书的专家们特意为孩子们设计的。

可是这还不行，孩子们闷得慌，不管是星期天还是其它日子。

于是我就想，是否所有这些专家都应该扪心自问这是为

什么。为什么我们那时在巴黎的这个区很快活。那时的巴黎是灰蒙蒙的，店铺灯光闪烁，屋顶高耸入天，狭长的天幕在头上伸展，长条的人行道上满是我们跳越着玩的电铃，真是应有尽有。有突然冒出的守门人，有牲畜拉的车，有卖花商人和夏季咖啡店设的露天座。这一切，是望不尽的，是一个迷宫，是街道纵横交错的大海……我们常常去探险。记得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条河，它在我们脚前流淌，拐过一条肮脏的街。我们俨然感到自己成了探险家。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乌尔克运河。我们眼看着漂着浮子和柴油的波纹流动，直到夜色降临才依依归去。

“走吗？”

差不多总是莫里斯提出问题。

我刚要回答，眼睛转向了大街，大街口上。

于是我看到他们来了。

他们是引人注目的。

一共两个人，身穿黑色的衣服，都是高大的男人，系着宽皮带。

他们穿着高筒皮靴，大概他们整天擦油，那靴子才会那么光亮。

莫里斯转过身来。

“纳粹德国党卫军。”他小声说。

我们看着他们走来，走得并不匆忙，迈着缓慢而笔直的步伐，就象是走在满是鼓号的广场上一样。

“你敢打赌说他们是来剃头的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有了这个念头。

我们象两个连体孩子一样贴在理发店的门面上，两个德

国人进去了。

这一下我们可乐了。

我们身后遮挡的是贴在玻璃上的一张通知，黄纸黑字：

“犹太人。”

理发间里，在从来没有过的异常沉静中，两个德国党卫军人耷拉着头，在犹太顾客中屈膝而坐，等着把他们的脑袋托付给我的犹太父亲或是犹太哥哥。

外边，两个犹太孩子笑得直不起腰。

第 二 章

亨利掸完了比比·科恩的领子，后者离开椅子走向柜台。我和莫里斯站在柜台后边，看着事态的发展。

我心里有点不安：这样做可能有点过分了。让这两个狡猾的家伙进到犹太人领地的中心，这太大胆了，太过分了。

亨利转向一个德国人。

“先生，请您过来吧。”

这个党卫军人站起身，坐到转椅上，军帽放在膝盖上。他在镜子里端详自己，那神情好象他的脸是个毫无意思的东西，甚至有点令人厌恶。

“您坐好了吗？”

“坐好了，请分一个直缝。”

我站在自动记录器后看着这一切，惊得傻了眼。一个会讲法语的德国人！更不要说，他讲法语比本地区许多人的口音还要纯正。

我望着他。他有一个很小的手枪套，锃亮锃亮的，枪柄露在外边，上面挂着一个小环微微晃动。一会儿他就该明白是在什么地方了，他会掏出枪来，发出叫喊，把我们都打死，包括楼上正在做饭的妈妈，她还不知道有两个纳粹分子在她的理发间呢。

迪瓦利埃在他的角落里读着报纸。他身边是克雷米厄，

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的邻居，他领儿子来理每月一次的平头。我认得克雷米厄的儿子，他和我在一个学校，课间和我一起玩耍。他一动也不动，个子本来就矮小，而现在他似乎想变得更加矮小。

还有哪些人，我应该是认得的，可是因为当时光顾着害怕，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阿尔贝在他顾客的波浪形头发上洒了洒洗剂。

“战争不是好玩的，是吗？”

警卫军人吓了一跳。这可能是第一次一个法国人向他说话。他的身子向上挪动了一下，好象是有了什么意外的收获。

“嗯，不是好玩的……”

他们继续谈着，其他人也插入了谈话，气氛变得友好了。讲法语的德国人给那个不懂法语的同伴翻译，后者用摇头点头参加了谈话，以致亨利不时尽力地扭正顾客的脑袋。这关系到是否会给这个日耳曼种的老爷的脸上留下一块刀伤的问题，这样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我看到爸爸全神贯注，伸着舌头。我的屁股已经为即刻可挨的殴打而痛起来了，不用等这两个家伙出门，我就会摔在阿尔贝的腿上，而莫里斯倒在亨利腿上，还要等他们打得手痛了才能继续理发。

“该您了，请过来吧。”

这是我爸爸在招呼第二个德国人。

后来尽管害怕，我还笑了一回，那是在萨米埃尔进来的时候。

他晚上常来，老朋友般地向我们问个好。他是个旧货商，在离我家二百米远的跳蚤市场上做生意，专营旧挂钟。货摊上什么都有，我和莫里斯常去那里乱翻……

他兴高采烈地进来了。

“大家好。”

爸爸手里正拿着毛巾，他麻利地把它叠好，然后放到德国纳粹党卫军人的脖子上。

萨米埃尔刚巧看到德国人的军服。

他的眼睛变得比我的弹子还要圆，还要大三倍。

“噢，噢，”他说，“噢，噢，噢……”

“噢，对了，”阿尔贝说，“我们这儿来人了。”

萨米埃尔捋了捋胡子。

“不要紧，”他说，“等这儿不忙了我再来。”

“好的，代问您太太好。”

萨米埃尔仍旧没有动弹，惊愕地看着奇特的顾客。

“一定办到，”他小声说，“一定办到。”

他又木呆呆地钉在那里几秒钟，然后蹑手蹑脚地走掉了。

三十秒钟之后，从欧也妮一絮大街到圣一乌昂大街，从每家犹太人开的饭馆灶堂间到每家犹太人开的瘦肉食品店的后屋，所有的人都知道若福老头成了招引德国国防军^①的理发师。

真是惊天动地。

在理发店里，谈话变得越来越友好。我爸爸巧妙地应付

① 德国国防军，1935—1945年纳粹德国的军队。

着谈话。

德国纳粹党卫军人在镜子里发现了我们俩的头。

“这两个男孩子是您的吗？”

爸爸微笑了。

“是的，这是些小坏蛋。”

德国人摇了摇头，露出怜悯的神情。真可笑，在一九四一年竟会有德国纳粹党卫军人怜悯犹太孩子。

“哎，”他说，“战争是可怕的，这都怪犹太人。”

理发剪子没有停过，现在该用推子了。

“您这样认为吗？”

德国人不容置否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确信如此。”

爸爸象个艺术家一样眯起一只眼，在德国人的鬓角上最后压了两下。

他手向上一掀拿起毛巾，然后请德国人在镜子里欣赏发型。

纳粹党卫队员满意地微笑了。

“很好，谢谢。”

他们走向柜台结帐。

爸爸绕到柜台后边找钱，我蜷缩在爸爸身边，看到他的脸仰着，非常愉快地微笑着。

两个大兵重新戴上军帽。

“你们满意吗？头理得好吗？”

“很好，好极了。”

“那好，”爸爸说，“在你们走之前，我得告诉你们，所有这里的人都是犹太人。”

爸爸年轻时演过戏，每天晚上他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那样做着丰富的手势。

这会儿，没有一个在舞台上成排脚灯前的演员能象柜台后的若福老头这样有尊严。

理发间里，时间停滞了。后来克雷米厄第一个起身，他紧拉着儿子的手。他儿子也站起来了。其他人随着他们也站起来。

迪瓦利埃什么也没说，他放下报纸，收起烟斗。于是，这个在圣·欧斯达施教堂受洗礼并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弗兰索瓦·迪瓦利埃，即杰克·迪瓦利埃和若埃米·马什格兰所生的儿子站起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

党卫军人并没有发作。我觉得他的嘴唇忽然显得薄了。

“我指的是富裕的犹太人。”

硬币在柜台的玻璃板上弹响，然后是一阵靴子的声音。

他们可能已经走到大街的尽头了，而我们还凝固在那里发愣。我觉得有一阵子就象在神话故事里一样，一个精灵的仙女把我们变成了石头人，我们永远也转不活了。

直到魔力过去，大家又都重新缓缓坐下，我才醒悟自己躲过了打屁股。

爸爸在重新投入工作之前，轻柔地抚摸我和莫里斯的头。我闭上双眼，为了不让我的两哥哥在同一天里第二次看到他看到我哭了。

“你们安静点儿好不好！”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苏联著名的演员和导演（1863—1938）。